

抗战名将 叙事研究

丁伯林◎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2010sk501zd)成果

池州学院出版专项基金资助

抗战名将叙事研究

丁伯林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名将叙事研究/丁伯林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 12
ISBN 978-7-5650-3143-4

I. ①抗… II. ①丁… III. ①抗日战争—军事家—人物研究—中国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0579 号

抗战名将叙事研究

丁伯林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邮编	230009	开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电话	人文编辑部:0551-62903205	印张	15.25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字数	240 千字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印刷	安徽昶颀包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E-mail	hfutpress@163.com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3143-4

定价:3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赵稀方

丁伯林兄的大作出版，是一件可贺的事情。他让我写序，我觉得不太合适，让他最好找一位老先生。过了一阵，他又来找我，说没找到老先生，还是我的事。

说起来，丁兄的这本书，我也算是见证人。2007年，他来社科院文学所学习。要不是他提醒，我真没有意识到距今已经10年了。那时候他的开题和其后辗转奔波地找资料的情形，都如在眼前。

丁兄从安徽池州来，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物阜民丰的好地方，有好几位老同学在那里。他们的业余生活以喝酒为主，打扑克、洗脚为辅，生活气息相当浓厚。我从枯燥的北方去看同学，每每乐不思蜀，流连忘返。不过，丁兄有忧患意识，喝完酒、打完球以后，总觉得还缺点什么。于是他终于在年届中年并在学校担任行政职务的情况下，毅然决定放下一切，北上学习。

在北京期间，他很勤奋，完成了部分研究成果，并发表在顶级学术刊物上。一年以后要回去了，他很忧虑，告诉我不敢回去，因为一回去哥们就会拉他喝酒，他的学术雄心立马就烟消云散。现在他的书出来了，证明他并没有被拉下水。

在抗战研究的学术著作中，丁兄的这本书应该说是很有特色的。

特色首先在于“叙事”。不要小看这两个字，“叙事”事实上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即以非本质主义的态度看待历史，不是将书写看作是对于历史的真实反映，而是将书写看作是对于历史的叙述。也即所谓从“话语讲述的年代”变成“讲述话语的年代”。这种后现代史学观，奠定了当代西方学术的新方法。对于抗战的研究，我们从小学习的都是贬低国民党

的教科书，近年来则开始出现相反的情况，褒扬国民党正面战场。丁伯林的研究则并不预设立场，而是分析各种对于抗战书写的叙述立场和修辞策略，焦点从“是什么”转变到“为什么这样说”，旨在呈现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以及历史的复杂性。

随之而来的第二个特色，就是史料方面的。这种“叙事”的历史观，要求作者并非按照自己的观点去找材料，而是需要呈现出各种立场的方方面面的材料，在各种材料的紧张关系中，展现历史的张力。丁兄当时奔波于北京各大图书馆，查阅旧报刊，颇花了些工夫。在历史已经成为叙事的今天，材料的意义变得格外重要。从这本书的研究中，我们会发现很多新的材料，包括报刊、文件、书信、日记等等，这些辛苦得来的材料，构成了这本书的“亮点”。

民国的很多史料收藏在台湾，我在台湾任客座教授期间，不免也帮他注意一下。说起来，大陆学者可能觉得台湾的抗战研究很发达，或者很受欢迎。其实并不然。此前不久，我在台湾参加了一个会，有大陆学者痛陈国民党正面战场在大陆被忽略的情形，没想到在会议上应者寥寥。这里面所包含的历史悖论，实在值得注意。随着民进党在台湾的冒起，国民党江河日下，博得的同情越来越少。更吊诡的是，即使在台湾的国民党本身，也并不重视抗战。原因是，二战以后的冷战使得台湾和日本重新结盟，延误了台湾“去殖民”的历史。所以台湾人现在并不特别仇视日本，反而对大陆有怨恨，此乃历史悲剧也。

记得我在成功大学任客座教授的时候，有一次与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约好地方见面。我们俩都在孔庙附近问路，当地老人听不懂我的普通话，态度也很冷淡，而对藤井的日语却能听懂，并且很热情。人情冷暖，认同倒错，不能不让人感慨。这些都是题外话了。不过，这也说明我们对于抗战研究的重要性，说明丁兄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我和丁兄是大学同学，当时对于他的印象是，人长得帅，喜欢打篮球，说话幽默。青葱年代一别，再见时已是两鬓斑白，让人感觉到在时间面前人的渺小。怪不得他的池州的朋友都奉行及时行乐，不负春光，丁兄在那里埋头学术大概不免觉得寂寞。好在他已经说了，这本书写完，他就要开始享受生活了。

是为序。

前言

新历史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初滥觞自欧美国家，其代表人物为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路易斯·蒙特鲁斯（Louis Montrose）、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对其时盛行于欧美的新批评文本中心论的有力反拨，它借用了福柯“权力话语”的分析方法，“揭示权力与文学、社会与文化、心灵与肉体之间的二元对立”（王岳川语），轻视旧历史主义对正史、重大事件、伟大人物及所谓宏大叙事，却将凡人俗事、逸闻逸事纳入研究框架，“看其人性的扭曲或人性的生长，看在权力和权威的历史网络中心灵魂是以怎样的姿态去拆解正统学术，以怎样的怀疑否定的眼光对现存社会秩序质疑，以怎样的文化策略在文本和语境中将文学和文本重构为历史的课题”（王岳川语）。它打通文学、史学、政治学、哲学及社会学等学科的界限，将研究对象置于立体的学科视野中进行研究，使得文学研究在一个十分开阔的视野和更为深广的学术空间展开，也给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而丰富的活力。

新历史主义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译介阶段、评价阶段和应用阶段。在第一阶段中，王逢振首次介绍“新历史主义”这一概念（《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其后杨正润（《文学研究的重新历史化——从新历史主义看当代西方文艺学的重大变革》，《文艺报》，1989年3月4日，3月11日）、赵一凡（《什么是新历史主义》，《读书》，1991年第1期）对这一研究方法从理论到实践的介绍很快在大陆学界引起了共鸣，1993年由张京媛主编的译文集《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迅速传播，这个集子主要以美国学者H. 阿兰

穆·威瑟 (H. Aram Veese) 编辑的《新历史主义》为蓝本,同时收进了海登·怀特 (4篇)、弗雷德里克·詹姆森 (Fredric Jameson) (2篇) 六篇重要的新历史主义论文,它后来成为研究新历史主义最权威也是引用率最高的一部文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新历史主义在大陆进入评价阶段,大批学者以纵向和横向批评理论为参照,探寻其学术上的优长与不足,并对其作出见仁见智的评价,如《历史·文本·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刍议》(盛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5期)、《主体的定位与协合功能——评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杨正润,《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年1期)、《女权主义与“新历史主义”》(陈晓兰,《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弗莱和新历史主义及文化研究》(叶舒宪,《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1期)、《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盛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1期)、《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王岳川,《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新历史主义与中国历史精神之比较》(曾艳兵,《国外文学》,1998年第1期)、《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学说与海明威传记》(邹溱,《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盲区》(王岳川,《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等。专著方面有《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王岳川,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岳川先生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最为瞩目的研究成果,对于这一理论的中国化做出了很大贡献。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新历史主义研究进入第三阶段,尽管这一阶段仍有学者继续在理论上进行进一步探索,但大多数学者从理论建构走向了以理论为依据的阐释实践。例如,《新历史主义莎评之新》(谈瀛洲,《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4期)、《〈家园〉:一部具有新历史主义倾向的小说》(黄洁,《当代文坛》,2001年第2期)、《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价值取向和社会效应》(张进,《湘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乔治·艾略特早期作品的新历史主义解读》(陈蕾蕾,《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2期)、《反叛的悖论——新历史主义文学功能论与〈麦田里的守望者〉》(刘萍,《当代外国文学》,2002年第4期)、《我为什么要写〈省委书记〉——求助于新历史主义的一次阐述》(陆天明,《当代作家评

论》，2002年第6期）、《翻译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话语》（朱安博，《中国翻译》，2005年第2期）、《新历史主义观照下的〈李尔王〉》（马广利，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4月）、《从新历史主义看史传与中国古典小说的亲性和性》（李育红，《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等等。专著有《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张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似是故人来：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20世纪英美文学》（石坚、王欣，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新历史主义批评：〈外婆的日用家当〉研究》（李荣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格林布拉特批评理论研究》（王进，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这一阶段是新历史主义研究在中国的勃发期，也是新历史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相对成熟期，其论著占总量的80%以上，论文占总量的90%以上。其中张进、曾艳兵、石恢、曾耀农、张清华、王进、马广利等作者在这一领域十分活跃，更为可喜的是一大批新人介入这一领域的研究，特别是一些成果颇丰的硕士、博士论文对这一领域的切入，大大加快了新历史主义研究的步伐。

抗战文学研究的前期研究，张中良在《抗战文学研究概况与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中作过全面综述。进入新时期后，因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松动，特别是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既褒扬了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中国共产党一方的抗日将领，也肯定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国民党一方的著名将军。犹如蓄势待发的弓弩，但等号令的发出一般，此后，抗战文学研究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奇丽景观，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前辈学者的大力促进。前期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已经取得卓越功勋的前辈学者以自己敏锐的学术嗅觉，在发令枪尚余音袅袅之际，杨义（《历史记忆与21世纪的东亚学》）、严家炎（《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对抗战文学的一点认识》）、刘增杰（《抗战反思文学思潮的独特品格》）、王富仁（《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黄修己（《对“战争文学”的反思》）、吴福辉（《战争、文学和个人记忆》）等即在《河北学刊》（2005年第5

期)联袂推出重磅文章率先领跑。他们这一举动,给后学们极大的鼓舞,也给了他们足够的胆气。

二是中坚力量的前沿探索。在前辈学者的引领下,以张中良(秦弓)、房福贤、李建平为代表的中坚力量裹挟而至。张中良“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系列文章既希望人们留住即将淡漠的正面战场的抗战记忆(《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又唤醒了人们关于“滇缅公路”(《抗战文学中的滇缅公路》,《抗战文化研究》,2008年第二辑)、“武汉会战”(《抗战文学中的武汉会战》,《抗战文化研究》,2009年第三辑)、“血染昆仑关”(《抗战文学与昆仑关战役》,《抗战文化研究》,2010年第四辑)、“东方莫斯科保卫战”(《抗战文学与衡阳保卫战》,《抗战文化研究》,2012年第六辑)的抗战民族记忆;房福贤的研究集中在理论建构方面,如抗战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抗日文学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东岳论丛》,2005年第5期),新时期抗战文学从意识形态言说向民间、个人立场的转身问题(《风雨60年:从文学抗日到抗日文学》,《理论学刊》,2005年第9期),他的专著《中国抗战文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则是将他的研究成果条理化、系统化的结果。来自广西的李建平做的是窄而深的抗战文学中的关于“桂林”(《一个抗日城市灾难与战斗的文学记忆——1937年以来中国作家笔下的桂林抗战文化城兴亡图像及战争记忆》,《抗战文化研究》,2007年第一辑;《从桂林抗战文学研究看史料发掘和思路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6期;《战时桂林的崛起及其抗战文化繁盛景观》,《抗战文化研究》,2011年第五辑;《抗日战争的历史呈现与影视剧创作——以桂林抗战文化为例谈谈抗日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历史把握》,《抗战文化研究》,2010年第四辑;《桂林抗战文艺的繁盛景观及其效应》,《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广西”(《广西抗战文化资源调查与文学利用》,《抗战文化研究》,2007年第一辑)的文化记忆。他们以深厚的学养和扎实的学风,将抗战文学研究推向更为深广的境界。

三是“川军”的异军突起。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的四川,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样,文学研究的“川军”也在抗战文学的研究中结出了累累硕果。他们以靳明全为中心,依托高校(四川大学、重庆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等)和重庆图书馆,先后成立了“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重庆中国大后方抗战历史文献中心”等研究机构,他们借助大后方丰厚的抗战文化资源,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专事抗战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组成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学术团队,并收获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如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新明全的系列著作:《重庆抗战文学论稿》(2003)、《重庆文学与外国文化》(2006)、《重庆抗战文学新论》(2009)、《重庆抗战文学区域性》(2012),以及由巴蜀书社出版的《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农村书写》(2012)、《大后方抗战文学异国形象论稿》(2012),段从学的《“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而这个团队成员围绕抗战文学的重庆叙事及资料整理等方面的学术论文竟有近百篇,其成果不可说不显赫!

四是日韩学者的联袂加盟。新世纪以来,随着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放,日韩学者也加入了抗战文学的研究行列,如日本的山本和雄(《我所见到抗日英雄赵一曼》,《党史文汇》,2002年第7期)、菊池一隆(《“亲日”与反日——抗战时期朝鲜华侨的艰难抉择》,《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4期)、岩佐昌曜(《记抗战时期的旧体诗杂志〈民族诗坛〉》)(《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杉本达夫(《关于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作家生活保障运动》,《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水羽信男(《抗战时期的自由主义:以王赣愚为中心》,《学术研究》,2010年第3期),以及韩国权五明的“郭沫若研究”(《郭沫若历史剧〈屈原〉在日本的上演与影响》,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不过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异,他们无法准确理解中华民族的抗战书写,而只游离于对他族文化理解的浅表层面上。

对抗战时期名将的研究势必涉及正面战场即国民党一方的将领,而在“权力话语”的制约下,这一领域一直未能取得理想成果。进入新世纪后,大陆在经济强势发展的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出从未有过的自信,呈现出明显的宽松态势。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国民党军队战斗系列的抗战将领、英雄群体的抗战功绩给予了高度评

价。这给理论界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学界人士奋力前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是，目前学术界尚无人从新历史主义视域来观照、研究抗战文学，特别是对相对比较敏感的抗战名将的叙事话语的研究尚为一块未开垦的土地，因此，在新历史主义视域下，从民族的、文化的角度，开展对抗战名将叙事的研究，就体现出我们积极的学术姿态。它对于增进国共两党的相互理解，进一步改善海峡两岸之间的关系，营构中华民族的和谐图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当然，这一课题的研究也有望为现代文学研究开辟一条新的路径，拓宽一片新的视野。

目 录

抗战名将叙事语境的变迁	(001)
文化身份与名将叙事	
——兼论戴安澜将军叙事	(010)
张自忠叙事	(028)
冯玉祥叙事	(048)
孙立人叙事	(086)
罗炳辉叙事	(134)
“孤军八百”叙事	(164)
抗战名将殉难叙事	(183)
“大刀”叙事	(205)
参考文献	(224)
后记 一剑磨成万事休	(229)

抗战名将叙事语境的变迁

如果我们把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对以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拯救民族于水火的抗战文学进行研究的所有课题或论文作一整体回望与检索的话，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政治话语对这一领域的强力干预。“文革”时期一元价值标准与当下多元价值体系对抗战名将的不同评价，就可充分证明这一点。

一、抗战名将叙事研究的历史轨迹

在今天宽松的政治语境之下，我们谈论、探讨抗战名将叙事可以以极为轻松的心境，泰然处之，无任何来自政治的恐惧感和现实的挤压感。然而，如果我们掀开“文革”那层比较沉重的历史帷幕，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竟是这样的表述：“抗日战争是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亿万人民群众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人民战争。”^①“国民党战场：它的军队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连续溃败，一溃千里，使大片国土被日寇侵占。解放区战场：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遵照毛主席指示，深入敌后方，发动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英勇抗击日寇，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据地。”^②在政治话语的控制下，叙事极尽其遮蔽与张扬之能事，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功绩一笔抹杀，将在正面战场上浴血奋战的中国国民党及军队、军人以某种“策略”完全排挤到历史的边缘。

然而，尽管历史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之下呈现出不同的文本形态，它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学习提纲（上册）[M]．上海：上海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出版，1973：43.

② 中国共产党历史学习提纲（上册）[M]．上海：上海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出版，1973：31.

们之间有些相近、相左，甚至相互抵牾，但是历史不会淡忘对下面这些抗战时期在民族精神的召唤之下以“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的精神与日寇搏杀的伟大人物的记忆。他们是“血战台儿庄”的李宗仁，死守南苑的佟麟阁、赵登禹，“站在那里，死在那里”^①的郝梦龄，气壮山河的王铭章，血染洪山的张自忠，“没有命令，死也不退”^②的谢晋元，“黄埔之英，民族之雄”^③的戴安澜，“仗剑出川”“不灭倭寇誓不还”^④的李家钰……他们以男儿的刚性和必死的信念，书写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族侵略的永恒记忆，与左权、彭雪枫们一样，他们都无愧为民族的优秀儿女。

那么，为什么到上世纪末甚至到本世纪初大陆的历史书写均以遮蔽的叙事策略来对待这些同样奋战于抗日战场的中国国民党的抗战将领呢？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十分明确地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⑤在此，文学艺术对政治的依附关系被政党领袖以纲领性文件形式确立下来。从此以后，直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文学艺术的政治功能都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稍越雷池一步者必获其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轻者被扣“右派”大帽，重者为此付出生命代价。应该说，延安时期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外族侵略者尚未被赶出国土，国内尽管“统一战线”仍在维持，但经“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之间势难两立的局面已露出端倪——提出这一主张是有其时代合理性的，即规定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人民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基本属性，从而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① 谢春涛：《抗日：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人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51。

② 谢春涛：《抗日：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人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129。

③ 周恩来同志为戴安澜将军书写的挽联。

④ 李家钰将军原诗：男儿仗剑出四川，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见谢春涛主编：《抗日：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人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215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867。

政党或者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围绕权力来展开的，而权力总是意味着不平等，因为权力总是“宰制性”和“非对称性”的。所谓“宰制性”和“非对称性”，汤普森作过这样的界定：“当既定的权力关系处于系统性非对称状态时，就可以把这种状态描述为宰治之一种。当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以一种持久的方式被赋予权力，而且在以这种方式阻止（或者在某个重要程度上不允许）其他人或团体接近这一权力时，无论进行这种阻止时基于何种基础，权力关系都是‘系统性非对称’的。”^① 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艺术永远是第二位的，由此确立了政治对于文学艺术的优先权，也确立了政治对于文学艺术的宰制关系。这种宰制关系的表现多种多样，譬如，文学艺术价值高下的判断标准不在于文学艺术作为独立学科门类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而在于它与政治之间的耦合程度。文学艺术的独立品格被政治消解甚至侵蚀，也就是说，文学艺术本身是没有多少话语权的。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指出，话语同时也是争夺的对象，历史不厌其烦地教诲我们：话语并不是转化成语言的斗争或统治系统，它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福柯的话无疑为延安时期“政治第一，艺术第二”作了极准确的注释：以政治的强制性来获取更多的话语权，是政治斗争的必由之路。

这样说来，始自“延安整风”，经由20世纪50年代初的“三反”“五反”，跨越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其实有着一脉相承的政治渊源，就是通过对政治的强化从内部来确立、稳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话语权；在党外，同样是通过政治和文学的叙事策略与其他党派争夺话语权，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和成立之初，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斗争，除极端化的军事暴力手段外，叙事在其中充当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异乎寻常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曾说过：“叙事产生权力，叙事还可以杜绝其他叙事的形成和出现。”^② 以叙事方式来压制、杜绝其他叙事的形成和出现，从而确立自己的权力地位，政治家们是深知其中三

① J. B. Thompson, *Idelolgy and Modern Cultur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 the Era of Mass Communication*, Stanford [M].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51.

②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Published by Vintage 1993, p. XⅢ.

昧的!

所以,回望自抗战始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大陆抗战文本中无论是历史的还是文学的叙事,奋战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将领之被淡化处理甚至被完全遮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任何政党在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处于相对弱小的状态时,都会以强力手段来尽可能控制各种形式的媒体,一方面利用它们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是利用它们来压制对手。因为叙事能“产生权力”!这是弱小者对自己的能力缺乏充分自信所表现出的普遍性的心理焦虑,以及消除这种心理焦虑的常见手段。

二、抗战名将叙事研究的现实走向

200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

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愾,共赴国难……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敌后战场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在空前惨烈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面对敌人的炮火勇往直前,面对死亡的威胁义无反顾,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用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抗战,中国人民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进而发展到战略反攻,终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走向胜利的进程中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①。

如果我们对胡锦涛同志这段文字作修辞学分析的话，应该包含下列叙事要素：

（一）这次全民族抗战中，是“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不是哪一政党、阶级、阶层或者团体的功劳。这当然不能无视与敌作战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将士。

（二）国民党开辟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同样重要，它们“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为体现这一“同样重要”，叙事者又分述了以下要素来予以支撑：

1.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与共产党敌后游击战、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同样重要”；

2. 共产党的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与国民党的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相并列，叙事十分注意在国共两党无以数计的抗日将领中，非常有修辞意味地在数量上予以对等，充分体现其“同样重要”；

3. “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八百壮士”等英雄群体相并列。

（一）（二）两大叙事要素之间其实有十分密切的承接关系。前者为概叙，后者为细叙。但其修辞指向却是完全相同的，叙事效果也是十分明确的：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国共两党所领导的军队“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结果。

这是迄今为止，大陆一方对国民党及其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作用的最新、更是最高评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同志的这一评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它体现了尊重历史的姿态。如果根据“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历史是“没有真相”的，福柯和德里达认为，人的思想从来就不是自主的、独立的。既然如此，人也就无法真正认识自己与周围的世界，因此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罗兰·巴特指

^① 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05-09-03），news.xinhuanet.com.